

追求完善的必由之路

——比较鲁迅与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

王雨海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 忏悔意识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求真、求善、求美的内在心理活动和自我约束机制。鲁迅和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表现为忏悔主体的自觉性、忏悔内容的深刻性和忏悔过程的连续性与持久性;同时,他们在忏悔的终极指向、忏悔的具体内容和忏悔的方法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鲁迅与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对世界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鲁迅;托尔斯泰;忏悔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1.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42(2004)02-0086-04

忏悔本是西方人基于对原罪的恐惧和对天国的向往而产生的一种神圣的宗教行为。作为心灵的一种内在活动,忏悔是主体内省和反思之后对自我进行的谴责与否定,体现着人对至真、至善、至美的追求。忏悔意识是忏悔的升华,它使忏悔成为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它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求真、求善、求美的内在心理活动和自我约束机制,它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自我完善行为。忏悔意识的产生和忏悔意识程度的强弱是根据人们求真、求善、求美的程度和对真、善、美的理解程度不同而定的。在西方社会,大凡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及具有突出历史贡献的人物,他们都有强烈的忏悔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正是忏悔意识发展变化的过程。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同整个社会成员的忏悔意识有密切的关系。忏悔录的写作在西方非常普遍,像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卢梭的《忏悔录》、托尔斯泰的《忏悔录》都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名著,对西方人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中国,忏悔并不是一种宗教行为,而是一种道德行为。中国很早就有反省修身的观念,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代表了中国人的道德要求。但中国人的反省或者说忏悔,并不是西方所指向的天国,而是现实世界,其最高的目标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具体的忏悔过程中,中国人不讲究外在的仪式和行为,重在内在的心性的

自觉,所以,中国人的忏悔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灵活性。由于没有严格的宗教戒律的要求,中国人的忏悔不具有普遍性,真正具有忏悔意识的中国人相对较少。同时,由于中国人把人的完善指向现实并分成多个程度不同的等级,容易产生自我的满足,所以中国人的忏悔相对而言较少有痛苦感和孤独感。而西方人的忏悔则是渴望人成为神,并把它作为惟一的终极追求,这使西方人的忏悔带有强烈的痛苦感和悲剧意蕴。所以,有人按照西方人的忏悔意识观念来看中国人,认为中国人不具有忏悔意识,这显然是有一定根据的。

自从西风东渐,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主动接受了西方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对人的完善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不再停留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上,而主要从真正的人的角度去检讨社会和自我,对自我的非人思想和行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解剖和批判,从而形成了新型的忏悔意识。在这种忏悔意识的支配下,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自觉地去揭示自我灵魂的恶,希望通过对恶的否定走向自我的完善、社会的完善和人类的完善。鲁迅则是这种新型忏悔意识的最杰出的代表,正是由于他强烈的忏悔意识,才形成了鲁迅深刻而伟大的思想,同时也开创了中国文化中的新气象。

鲁迅的忏悔意识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为了更好地理解鲁迅的忏悔意识,我们把他同“忏悔的贵族”的杰出代表托尔斯泰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我们渴望能够发现忏悔意识更深刻的文学和文化学意义。

收稿日期:2003-12-11

作者简介:王雨海(1962-),男,河南固始人,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鲁迅与托尔斯泰都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伟大的自我忏悔者。他们的忏悔意识呈现出很多的一致性。

首先,他们的忏悔意识都具有主体自觉性。鲁迅与托尔斯泰在个人的生活上都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他们的忏悔完全是一种心灵的需要,是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自觉行为。鲁迅与托尔斯泰都有记日记的良好习惯,他们都从青年时期一直记到人生的终点。日记不仅记录了个人的生活事项,而且在记日记的同时,他们会对自己每天的行为和思想进行检讨。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的日记则更为明显。托尔斯泰规定自己在每天的日记中,要记录自己在当天所做的错事和好事,并且要分析自己的思想和动机,对不好的思想和罪恶的念头还要进行自我的谴责。因而,托尔斯泰的日记可以说是托尔斯泰的终身忏悔录。鲁迅虽然在日记中没有明显地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严厉的检讨,但在与友人的书信和自己的创作中,他毫不隐讳地暴露自己灵魂的毒气与鬼气,特别是他在同许广平的通信中,毫不隐讳自己的缺点和思想阴暗面。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1](P284)}鲁迅正是通过对自己的解剖来达到对自我的忏悔。同时,鲁迅与托尔斯泰还自觉地把自己的创作作为对自我的思想探索,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通过一定的人物形象来对自我人性的恶进行解剖和忏悔,使自我的忏悔得到延展。鲁迅笔下的“我”在很大程度上带有鲁迅自我的影子,从小说到散文,“我”随处可见,“我”在鲁迅的描写中是一个有着罪恶感、痛苦感、充满着矛盾困惑而又始终不忘追求的人物形象,他是过客又是战士,是孤独者又是至善的追求者。鲁迅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在自觉进行着自我的完善。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忏悔贵族形象”,这些“忏悔贵族形象”正是托尔斯泰自我忏悔的形象化写照。托尔斯泰不把自己当作作家看待,而以思想家自居,其用意是希望人们能够把他的作品看成是托尔斯泰自我完善的真实再现。托尔斯泰自觉用文学创作的形式来展露自我忏悔、自我完善的过程,显见托尔斯泰忏悔的真诚与执著。

其次,他们的忏悔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刻性。鲁迅与托尔斯泰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进行忏悔,使忏悔的意义更加深刻。鲁迅站在真正人的高度进行自我的忏悔。鲁迅心目中的人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它不是西方资产阶级所标榜的个性主义的自私自利的人,也不是中国社会中奴性的人,它是有着坚强的意志力、自我的独立性、顽强的生命力、憎爱分明且血肉丰满的人。它超越了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抛弃了尼采超人的狂妄自大,彻底否定了中国奴性人格的卑怯贪生,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在这样的高度进行的忏悔,对人们的引导作用是非常富

有意义的,它不让人们去追求虚幻的天国,做毫无意义的幻想,它让人们更多地抛弃人身上的兽性,更多地占有高尚的精神性,它让人真正地站起来,而不是匍匐在地;它让人不再关注虚假的外在,真诚地、勇敢地从现在做起,从自我做起,真正做自己的主人。正是从立人这一目标出发,鲁迅对自身的非人思想和行为进行了痛苦的解剖和忏悔。他说:“我很憎恶我自己。”“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2](P430-431)}

由于鲁迅早年读了很多古书,他对自己受到封建文化的影响非常不满,他说:“自己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托尔斯泰则站在神学的角度来对自我进行忏悔,但托尔斯泰的神学并非是基督教的神学,而是托尔斯泰心目中的仁爱至善,是一种完全的精神化。托尔斯泰认为人的生命应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兽性的,一部分是精神的。所谓精神的,即毫无保留地爱别人。托尔斯泰在总结自己的生活时说:“我身上有两种要素,精神的和肉体的,它们互相斗争着。精神的要素逐渐取得胜利。我通过切身体验认识两种要素的斗争,并称之为我的生命。”^{[3\1](P289)}此外,鲁迅与托尔斯泰忏悔的力度是深刻的。鲁迅不仅直陈自己内心世界的毒气与鬼气,而且,“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陨颠”,“决心自食,欲知本味”。^{[4](P202)}因为甚感自己思想太黑暗,“有时则竟……希望生命从速消磨”。^{[2](P79)}对社会和自我的黑暗不能消解,使鲁迅对社会和自我产生了强烈的憎恶和愤激情绪,他希望地下的烈火将整个黑暗的社会连同自我一同焚毁。“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4](P166)}鲁迅的这种胆略来自于他对自我的深刻忏悔和对人道社会的热烈渴望。托尔斯泰对自我的忏悔也毫不留情,他说:“如果让我为历史写封面题词,我要写上‘毫不隐讳’四个大字。”^{[3](P52)}他自我忏悔道:“我丑陋,笨拙,不爱清洁,没有上流社会的教养,我容易动怒,使人感到乏味,不虚心,偏狭,像孩子一样怕羞。我几乎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3](P157)}鲁迅与托尔斯泰在忏悔中都达到了至真至诚,其深刻性是显而易见的。

再次,他们的忏悔具有连续性和持久性。鲁迅与托尔斯泰时时不忘检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一生都在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严格的解剖和忏悔。鲁迅借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出了自己的人生追求,“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5](P104)}不但以残酷的“精神底苦刑”拷问别人灵魂中的卑污,“送他们到那反省,矫正,忏悔,苏生的路上去”,而且“将自己也加以精神底苦刑”,“从年青时候起,一直拷问到死灭。”

[5](P108) 托尔斯泰一生坚持记日记,实际上是进行着一生的忏悔。特别是到了晚年,托尔斯泰由于自己的平民化意愿没有实现,加之夫妻之间不能愈合的矛盾,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忏悔中,他说:“对我自己的地位,以及世界上的一切疯狂行为,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羞愧。”托尔斯泰晚年的多次离家出走,与他深深的自责和忏悔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

鲁迅与托尔斯泰都在忏悔中完善自我,但在忏悔的指向上、忏悔的内容、忏悔的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

从忏悔的指向上看,鲁迅更多地指向人的独立性与意志力,建立健全的人格和个性,亦即鲁迅提倡的健康的个性主义。鲁迅所指向的个性主义不是西方的个性主义,而是鲁迅通过自己生命体验所感受到的个性主义,这种个性主义的突出特点就是顽强的生命意识和清醒的实践意识。即生命必须活着,生命只能活着。凡是与活着的生命相违背的死的、衰败的、不动的、颓废的、保守的、虚假的、怯弱的和顺从的思想和行为都应该受到否定。鲁迅也正是在生命意识和实践意识的指引下对自己的非生命意识和非实践意识进行了忏悔,这成为一根主线贯穿在鲁迅的忏悔意识中。托尔斯泰的忏悔则是指向上帝。他说:“我的上帝,求你帮助我,教我如何去做。我只愿按你的意志,而不是按我的意志去做。”托尔斯泰心目中的上帝并不完全等同于基督教所说的上帝,它有时是指最高的善。他说:“当我从神学的角度来谈的时候,我发现,几乎一切民族都承认至善,并且把努力达到至善看作一切人的目的。”[3](P6)无论是上帝还是至善,都是托尔斯泰追求的终极目标。与托尔斯泰相比,鲁迅不承认终极目标,反对止于至善。他说“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6](P110)相较而言,托尔斯泰的忏悔指向具有一定的永恒性,但也具有虚假性和非现实性,它把人们引向了现实和人生之外,具有不可实现性;鲁迅的忏悔指向具有一定的变动性,但却具有真实性和现实实践性,他把人们引向自我和现实,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从忏悔的内容看,鲁迅更多地集中在自我精神的矛盾困惑上,集中在弃旧趋新的痛苦和孤独上。鲁迅渴望摆脱过去的羁绊,完全走光明的道路,“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或者与黑暗斗争,同黑暗同归于尽。但历史和现实逼鲁迅陷入痛苦与孤独之中,他不无忧郁地喊道:“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4](P165)他“忽而爱人,忽而憎人”, [2](P79)显示了鲁迅内心世界的深刻的矛盾性。鲁迅的矛盾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并遭到人们的围攻和打击,这加剧

了鲁迅的孤独感。“独自远行”的过客形象成了鲁迅的人生写照。托尔斯泰早年忏悔的内容更多地集中在自己的生活琐事上,集中在自己同周围人的关系上。托尔斯泰开始是以一个平民者的形象来要求自己的,他发现自己身上存在着贵族阶级的奢侈、懒惰、自私、好色、贪婪、虚荣等很多的缺点。他自我忏悔道:“可怕呀!我是个赌徒和酒鬼……因为九个月以来我就是个最不足挂齿、最懦弱、最无聊、最庸俗的人。”[3](P107)托尔斯泰的晚年则从精神上进行自我的忏悔,并从忏悔中得到满足。他说:“我感到死亡越来越近。毫无疑问,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生命越来越精神化,所有的大约都是如此。”[3](P355)两相比较,鲁迅在忏悔的内容上缺乏托尔斯泰的丰富性和全面性,托尔斯泰对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真诚的解剖和忏悔,鲁迅则主要集中在自我思想的矛盾性上,且不够丰富,这样使我们对于鲁迅的忏悔的认识缺乏足够的资料。同时,鲁迅对自我的忏悔没有托尔斯泰的直白,有不可言说的苦衷,托尔斯泰则显示出毫不隐讳的特点。鲁迅与托尔斯泰在忏悔内容上的不同同他们的生活处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有关。

从忏悔的方式看,鲁迅较多采用了隐晦的方式,而托尔斯泰则采用平白直叙的方式。鲁迅除在部分书信中对自我进行忏悔外,很多是在他的文学作品中隐喻式地披露自我之恶。即使在同很亲密的人的通信中,对自我的忏悔也只是曲笔概括,而没有像托尔斯泰那样毫无保留地展露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托尔斯泰除了在文学作品中揭示自我的忏悔过程,还在日记、书信和著作中对自我之恶进行忏悔,为此,他还专门写有一本《忏悔录》,可见托尔斯泰忏悔的直白。这种方法上的不同,不能说鲁迅有意隐瞒自己的缺点,或者说鲁迅忏悔得不够真诚,应该看到他们两人所处的生活境遇和文化传统对他们忏悔方法的影响。鲁迅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生活在中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地带,为了生活的需要还当过一段小官僚,由于当时政治的险恶及人心叵测,鲁迅有很多的思想都难以直说,鲁迅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急剧变更的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和道德在人们的头脑中还根深蒂固,中国文化中长期形成的“讳”的观念使中国人难以产生认真的忏悔思想和行为,鲁迅直白的忏悔不仅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还会给无聊的文人以围攻的把柄,这样会置自己于被动的地位,不仅不能反击敌人,还会遭到敌人的攻击;鲁迅忏悔的方式同自己的创作风格有着密切的联系,鲁迅一向以简练、含蓄、深刻、沉郁的风格著称,这使鲁迅在自我的忏悔中也是采用了同样的方式,喜欢采用曲笔和隐晦的语言来表达对自己的不满与自责,鲁迅忏悔方式的隐晦同自己要忏悔的内容也有很大关系,鲁迅婚姻不幸、兄弟失和、对母亲盲目之爱的不能拒绝以及诸多人

际关系的尴尬处境,使鲁迅在自我的忏悔中欲说还休,欲罢不能,所以只好采用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托尔斯泰同鲁迅的生活环境有很大的不同,他主要生活在远离俄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偏僻的农村,而且又是在自己的庄园,这使托尔斯泰处于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加之托尔斯泰家族又是俄国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在俄国的政治地位非常高,托尔斯泰在家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真正可以达到毫不隐讳,俄国文化受基督教文化影响较大,忏悔是一个真诚的人应该具有的行为,自我的忏悔在俄国很容易被人们接受,并且忏悔的真诚还会赢得人们的赞赏;托尔斯泰的创作风格也影响了他的忏悔方式,托尔斯泰在创作中常用心灵辩证法的方式进行人物刻画,他在自我的忏悔中也采用了细致的心灵剖析法;托尔斯泰忏悔内容的琐碎使他易于采用直白的方法。

四

鲁迅与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具有深刻的文学和文化学意义,它对世界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文学的角度看,强烈的忏悔意识是优秀作家的鲜明标志,伟大的作家都是人类和自我的伟大审问者,同时也是自我和人类的伟大的忏悔者。因为忏悔是对苦难的最好记忆和教育,因为只有忏悔才能真正地体会那颤抖的时代和人类的灵魂。他们从自我的忏悔起,逐步承担起了整个民族和人类的忏悔的任务,代表着整个人类去忍受精神的苦刑,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正如萨特所说“我对自己负责,也对其他一切人负责。我是在创造某一种经我自己挑选的人的形象。我在挑选自己的形象时,也选定了人类的形象。”^[7](P114)]这一点在西方文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弥尔顿、卢梭、雨果、霍桑、陀思妥耶夫斯基、艾特玛托夫等大量作家,不仅自己有强烈的忏悔意识,而且在作品中最善于引导读者去忏悔,他们不仅对自己忏悔,而且引导人们对整个人类自身进行忏悔,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产生忧虑和困惑。在中国,伟大的作家也多具有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以及由反省意识而产生的忧患意识,如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等。虽然中西文学家在自我忏悔上有很大的差别,但对真、善、美的强烈的渴求和对假、恶、丑的极度的憎恶使他们都具有了深刻的忏悔意识。鲁迅与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具有鲜明的代表性,他们从自我的忏悔出发对整个民族以至人类的弱点与缺陷感到羞愧,从而充满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中国留学生和“许多中国人”观看日本人

杀自己同胞时的麻木情形,引起了鲁迅对整个中华民族愚弱的精神状态的反思与忏悔,他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充满了忧虑,并立志用文学来改变人们的精神。托尔斯泰在进行自我忏悔时,实际上是代表整个俄国贵族阶级进行忏悔,他从贵族阶级的堕落中看到了俄国社会的衰败,他希望唤醒贵族阶级进行忏悔来挽救贵族阶级的命运,虽然显得有些幼稚,但这清楚地表明了托尔斯泰由忏悔而产生的强烈的忧患意识。鲁迅与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带给文学的启示意义就是:具有强烈忏悔意识的作家的创作更具有社会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使文学创作更接近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在忧患意识引导下的文学创作更能够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这种创作常常是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我们当前的文学家太需要忏悔意识和忧患意识了!无论文学怎样发展,忏悔意识和忧患意识都将是文学家最基本的一条创作底线。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鲁迅与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不仅对中国和俄国的文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世界的文化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当前世界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与人类进步方向相背的现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泛滥,人本身被零散化、空心化、平面化,“人们成为没有记忆、没有深度、没有历史的平面人”,^[8]接受型、剥削型、囤积型、市场型等新新人类大量涌现。在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人们只知自我包装、自我吹捧、自我表扬,而不知自我忏悔。面对这样的世界文化潮流,文化建设的任务就显得非常沉重。如何使人类准确把握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并在正确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指导之下检讨人生和社会的思想与行为,培养人们自觉的忏悔意识,使人们在完善自我的同时完善社会和人类,这将是摆在中国和世界人民面前的一个艰巨而持久的任务。在新的文化建设中,鲁迅与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仍然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 [1] 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2] 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3]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7卷[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 [4] 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5] 鲁迅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6] 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7] 万俊人.于无声处——重读萨特[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 [8] 邹文广,常晋芳.当代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J].学海,2001,(5).

[责任编辑 刘剑涛]